

绪 论

第一节 亳州旧志研究概述

一、亳州旧志概念界定

亳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地势显要,人才辈出。“亳地属在一隅,实淮豫之交壤,南北通衢,中州锁钥。其间名贤之所布政、人物之所钟生,稽之前史,彰彰犹在”。^① 据现存亳州旧志记载,亳州古称“谯县”“谯郡”等名,直到北周大象元年(579),置亳州总管府,“按:此时南兖州陈留郡俱废,谯始名亳”。^② 后来虽偶尔更名,但大都以“亳州”为称。

本书所探讨的“亳州旧志”,就时间而论,是指新中国成立以前历次所修的亳州志书;就范围和内容而言,是指以“亳州(包括亳县)”命名的志书。笔者查阅《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等正史中的艺文记载,没有找到以“亳州”命名的地理类书籍,在《二十五史

① (清)华度修:(乾隆五年)《亳州志·华度序》,清乾隆五年(1740)刻本。

② (清)郑交泰修:(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卷一,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

补编》所收录的《隋书经籍志补》《宋史艺文志补》《补元史艺文志》《补三史艺文志》等文献中,也没有查到以“亳州”命名的志书。

据文献记载,亳州旧志曾先后十一次纂修,最早始于明成化年间。《千顷堂书目》中收录了明代四种亳州志书,分别为贺思聪、王浩、李先芳和陈观所修,而《明史·艺文志》对(王浩)《亳州志》的记载,仅存其名和卷数。亳州旧志的纂修在清代达到鼎盛,先后有六次纂修,志书的质量也比较高,而民国时期的《亳县志略》则较为简略。

本书按照亳州旧志的编纂年代,分为明、清和民国三个时期。对于清代亳州旧志的分期,本书将打破传统的历史分期标准,以道光元年为界,分清前期和清后期两个时间段。因为道光元年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加剧,国势日趋衰落,清政府更加腐朽,虽然亳州旧志继续纂修,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明显变化。

目前笔者所能看到的亳州旧志有:嘉靖、顺治、乾隆和民国等时期所修的《亳州志》共七种,且同一种志书在不同专著中的著录名称也有差异。例如,《千顷堂书目》中的李先芳《亳州志》,在《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著录为(嘉靖)《亳州志》;又如华度主修的(乾隆五年)《亳州志》,在(光绪)《亳州志》则为“乾隆三年《亳州志》十六卷,亳州知州华度主修”。^①

乾隆年间,《亳州志》曾被三修,分别为乾隆五年、乾隆三十九年和乾隆五十五年,但是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和《中国地方志大辞典》中,均著录为(乾隆)《亳州志》。为了便于区分,本书对亳州旧志的命名进行统一,有确切年号的按年号命名,相同年号的在年号后加具体时间,无确切年号的按纂修人命

^① (清)钟泰,宗能徵修:(光绪)《亳州志》卷二十,清光绪二十年(1894)活字本。

名,下面以表格的形式呈现亳州旧志的相关概况。

亳州旧志概况一览表(11种)

	书名	主修者	卷数	版本	存佚
明代	(成化)《亳州志》	贺思聪	不详	不详	佚
	(正德)《亳州志》	石 玺	十卷	不详	佚
	(嘉靖)《亳州志》	李先芳	四卷	嘉靖四十四年刻本	存
	(陈观)《亳州志》	陈 观	不详	不详	佚
清代	(顺治)《亳州志》	刘泽溥	四卷	顺治十三年刻本	存
	(乾隆五年)《亳州志》	华 度	十六卷	乾隆五年刻本	存
	(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	郑交泰	十二卷首一卷	乾隆三十九年刻本	存
	(乾隆五十五年)《亳州志》	裴 振	不详	未刊刻	佚
	(道光)《亳州志》	任寿世	四十三卷首一卷	道光五年刻本	存
	(光绪)《亳州志》	宗能徵	二十卷首一卷	光绪二十一年活字本	存
民国	《亳县志略》	刘治堂	未分卷	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存

注:此表是笔者根据现存亳州旧志记载,并参考相关书目专著及其他文献制作而成。

二、亳州旧志的研究现状

我国地方志种类繁多、内容宏富。安徽地方志的编纂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开始,刘尚恒先生考证:“其地方志的编纂,最早可以追溯到后汉朱瑒的《九江寿春记》,寿春为汉九江郡治所在,包括今天安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其书虽已亡佚,清代王漠

有个辑本,收录在《汉唐地理书钞》里,还可以略见其梗概。”^①根据刘尚恒先生的统计,安徽目前现存各类旧志共 418 种。

近年来,对安徽地方志的研究,成果丰硕。专著方面,周始的《皖志述略》和史州的《安徽史志综述》,对安徽各地的历史沿革、名胜古迹等内容,均有详细记述。刘尚恒的《安徽方志考略》,在对安徽旧志作整体考察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庐州、安庆、徽州等地的方志概况,对一些安徽重要志书作了详细介绍。宫为之的《皖志史稿》,从志书的体例演变和发展过程等角度,深入研究了安徽方志的历史变化过程,详细阐述了安徽方志的发展和演变规律。论文方面,刘尚恒的《安徽方志概述》,张安东的《论清代安徽方志的编纂体例》《清代安徽方志编修述论》,朱冠艾的《明代安徽地方志编写的热潮和成就》等,从宏观上对安徽方志的编修成就及其成因进行深入研究;蒲霞的《〈永乐大典〉所辑〈新安志〉研究》、肖建新的《〈新安志〉志源考述》、刘道胜的硕士论文《徽州旧志研究》、张健的《徽州方志考》、汪祚民的《安庆府志修纂考论》、冯早红的《略谈乾隆〈太平府志〉》、王嘉炜的硕士论文《章学诚安徽方志的编纂理论与实践》等论文,从具体志书或方志学家入手,对安徽旧志进行个案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安徽方志的研究领域。

目前涉及亳州旧志内容的著作,主要有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金恩辉、胡述兆主编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李学勤、吕文郁主编的《四库大辞典》等工具书,它们对存世的亳州旧志进行著录和提要式介绍。周始的《皖志述略》和史州的《安徽史志综述》,根据亳州旧志记载,简要介绍了亳州的历史沿革、胜景古迹、资源风物、重要史事以及掌故轶闻等内容。刘尚恒的《安徽方志考略》,对现存亳州旧志的版本等内容进行简要介绍,为亳州旧志的研究和利用提供了

① 刘尚恒:《安徽方志考略》,长春: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5年,第2~3页。

可靠的版本信息。

目前有关亳州旧志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章学诚所纂的(乾隆五十五年)《亳州志》方面,如王嘉炜的硕士论文《章学诚安徽方志的编纂理论与实践》,对本志书的编修过程、成书时间、体例特征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王嘉炜认为:“(乾隆五十五年)《亳州志》于次年二月修成。对于历时不到半年修成的《亳州志》,章学诚十分得意。”^①在修志理论方面,他认为:“‘方志立三书’之宏论在《亳州志》里已经初具基础。”在体例方面,将(乾隆五十五年)《亳州志》与章氏所修的《和州志》《湖北通志》及洪亮吉所修的《泾县志》进行比较,他认为章氏所修的《亳州志》处处体现出以史入志的宗旨。宫为之的《皖志史稿》和晁文璧的《章学诚〈亳州志〉质疑》,则对章学诚编修《亳州志》,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宫为之考察(道光)《亳州志》和(光绪)《亳州志》的旧志序跋,发现其中并没有提及章学诚所纂的《亳州志》;又据章学诚在当时的修志及活动情况,得出结论认为,章氏所修此本《亳州志》并未成书。“章学诚于乾隆五十三年冬,应亳州知州裴振的邀请举家迁亳,纂修《亳州志》,乃是事实,并打算在总结长期修志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但未能如愿,仅仅写好了六则‘例议’”。^②关于章氏所修的《亳州志》是否成书的问题,由于缺乏确切的文献记载,目前还存有争议。

综上所述,以前学术界对历次所修亳州旧志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具体志书的著录、介绍和考证上,从整体上对历次所修的《亳州志》进行系统研究和专门考察,目前尚未查到。本书将以目前存世的七种《亳州志》为研究对象,借助于相关书目,运用文献学和比较研究等方法,对亳州旧志的整体概貌作系统的探讨与总结,从而发掘亳州旧志的学术价值,为旧志的利用和

① 王嘉炜:《章学诚安徽方志的编纂理论与实践》,2008年山东大学硕士论文。

② 宫为之:《皖志史稿》,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7页。

进一步研究提供依据。

三、亳州旧志研究内容及价值

方志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存世的七种《亳州志》,详细记载了当地的历史沿革、物产、古迹、民俗等内容,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情况,是研究亳州乃至整个皖北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资料。另外,现存部分早期旧志,由于时间久远,损坏严重、残缺不全,有必要对这部分文化遗产进行整理研究,使之能更好地为当地建设服务。

在历次所修的《亳州志》中,保存了大量有关当地的地理水文、名胜古迹等方面的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如有些亳州旧志中收录了《汤陵碑记》《大飨碑》等40余篇碑文,还保存了大量的诗词、文赋等文学作品;旧志中的“舆地”“营建”等类目,则详细记载了当地重要古迹的具体位置、修建情况等内容;有些《亳州志·人物志》中,保存了曹冲、曹植、华佗等不少三国时期的人物传记,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保存了重要资料。对现存亳州旧志加以系统研究,可为进一步对其进行整理和保护,提供详细、科学的资料支撑。另外,部分志书出自章学诚、刘开等名家之手,他们提出了一些值得借鉴的修志见解,如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以己意增饰”的修志原则,注重章法,主张“史家法度”的编纂要求,强调“使郡人小惩而大诫,得以寡过”的教化作用等,对当前的修志工作具有指导或借鉴意义。

近年来,亳州市围绕现代中药、旅游文化等产业建设,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社会结构转型,努力实现政治、经济等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亳州志》详细记载了当地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面貌及物产资源等情况,对亳州市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卷三“古迹”类目中记载“唐武德中析城父置药城”等内容,(光绪)《亳州志·舆地志·古迹》卷二

则详细记载了亳州牡丹的相关情况,是研究亳州药业经济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在亳州旧志的“古迹”“坛庙”“陵墓”等类目中,对于现存的 200 余处国家、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相关情况,都有涉及,同时旧志中还保存了许多当地的民俗风情、地方特产等文献资料,为当地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和现实依据。

第二节 亳州地方文化——亳文化

地域广袤、幅员辽阔的神州大地,孕育出数量众多、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中心,这些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共同构筑起古老而厚重的华夏文明。如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①作为众多地域文化中心之一的亳州地方文化,既不同于北邻的河洛文化、齐鲁文化,也有别于南接的徽州文化,它所独具的个性和风格,是其他任何地域文化都无法涵盖的。有关亳州地方文化的渊源流变、各时期的成就及其社会、经济价值,张立驰、魏宏灿在《亳文化略论》中已进行了详细研究,就不再一一赘述。这里试从地理空间、地域特色和现实意义三个方面,对亳州地方文化进行多维度探讨。

一、亳文化的地理空间

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之父”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

^① 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277页。

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①其实,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之间文化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各个地方之间的文化形态,也存有较大的差异,因为“文化是历史发展的沉淀,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凝聚形成的。在文化中,可以看到历史的痕迹,可以看到自然环境的痕迹。因此文化是有强烈区域性的”。^②

中国文化区域格局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民族宗法制度的瓦解,早期的区域文化格局开始初步形成,“地理差别,从经济上制约了文化的区域构成;邦国林立,从政治上强化了文化的区域分野;大师并起,从学术上突出了文化的区域特色;而上古时代丰富多彩的民风异俗的流播传扬,又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区域文化氛围”。^③就全国而言,较早形成且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区域文化中心,主要有齐鲁文化、楚文化、秦文化、晋文化、吴越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等,在这些文化的影响和带动下,又相继产生了亳文化、徽文化、关东文化、河洛文化、岭南文化等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区。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一个地域文化中心的最终形成,一般包括文化丛的产生、文化圈的建立和文化区的最后形成三个阶段。“亳文化历史悠久,积淀厚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架构,其中包括史前文化、帝都文化、老庄文化、宗教文化、曹魏文化、医药文化、休闲养生文化、商贸文化、‘古井’文化、民俗文化等”。^④如此深厚、丰富的地域文化,必然形成较为清晰的亳文化区的地理空间界定。

① [英]泰勒著,蔡江农编译:《原始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页。

② 胡兆量、阿尔斯郎、琼达等编著:《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页。

③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国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04页。

④ 张立驰、魏宏灿:《亳文化略论》,《学术界》,2011年第2期。

1. 从亳文化的渊源看

就整个中国文化区域格局而言,虽说春秋战国时期便初具规模,但单就亳文化而论,其生发的时间则更为久远。“因为文化区不仅是一个文化的空间分类概念,而且还是一个历史概念。它的文化特质由一代又一代不断地进行传递、发展、积累,保留下来”。^① 有“中国原始第一村”之称的蒙城尉迟寺遗址,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晚期聚落遗存。我们知道,早期人类居住环境的长期稳定和发展,离不开农业的保障,从尉迟寺遗址的文化遗存和规模来看,早在5000年前,涡河一带,已是水草丰美,人口聚集,村落初现,进入了农业文明时代。“不仅栽培具有北方特征的粟类作物,也栽培具有南方特征的水稻作物,表现了黄淮地区农业经济的特点,揭示了史前农业经济的多样性和特殊性”。^② 此地优越的自然环境、良好的农业基础、稳定的聚落生活,无疑是亳文化诞生的最佳摇篮。

3700年前,商汤定都于此,《尚书·立政》载:“夷、微、庐、烝、三亳阪尹。”有关“三亳”的具体位置和解释,历代聚讼不已。孔颖达《尚书正义》引皇甫谧:“三亳,三处之地,皆名为亳。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③(道光)《亳州志·舆地志》中所收的一篇《亳都考》,对“南亳、西亳和北亳”之位置以及和汤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究,并给出详细解释:“南亳者,汤为诸侯时所居之国也;西亳者,汤为天子时所迁之都也;北亳者,汤克夏时所会诸侯之地也。”^④而王夫之在《尚书稗疏·三亳阪尹》

① 蒋宝德、李鑫生主编:《中国地域文化》,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70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38页。

③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74页。

④ (清)任寿世修:(道光)《亳州志》卷一,清道光五年(1825)刻本。

卷四则云：“亳亦大也，与京同义。其犹雒邑之称周，而汉、唐之有两都，宋之有四京与？旧注殊疏。”在王夫之看来，“三亳”均为殷之故都。所以“可见早在商汤时期这里就成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是亳文化之根基”。^① 汤王之后，虽都城多迁，但大都仍以“亳”为称，直到北周大象元年(579)才恢复古称，改“谯”称“亳州”。

2. 从区域领属上看

文化区不同于现行的行政区划，因为行政区划是运用行政手段所划分的行政管理的区域单位，“而文化区则是一种特质文化的区域，是自然产生并由历史的延续而来。因此研究地域文化必须打破行政区划的局限，例如燕赵文化区不等于河北省，楚文化区不等同于湖北省……”^②加之历史上亳州领隶更迭频繁，行政区划变动较大，“古今輿地沿革不同，或为京畿，或为封国，或为郡邑，或更其名，或改其属，因时势之所宜，而变通之前后不必相承也”。^③ 因此亳文化的地理空间势必跨越多个现行的行政区域。另据(光绪)《亳州志·輿地志·沿革表》卷一记载：“三国魏，谯郡，注：又为谯都，谯县、城父县、酈县、山桑县、龙亢县、蕲县、铨县；晋，豫州，谯国，注：又为谯郡，谯县、城父县、酈县、山桑县、龙亢县、蕲县、铨县；唐，河南道总管府，亳州；宣武军都督府，谯郡，成州、文州、药城县、文成县、城父县、永城县、临涣县、朝城县、焦夷县；元，汴梁路，亳州、归德府，注：以下各县初隶亳州，后改府属，城父县、谯县、卫真县、鹿邑县、谷熟县、睢阳县、酈县、永城县；国朝，江南省，江南安徽省，颍州府，亳州直隶州，太和县、蒙城县。”^④

① 张立驰、魏宏灿：《亳文化略论》，《学术界》，2011年第2期。

② 蒋宝德、李鑫生主编：《中国地域文化》，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70页。

③ (清)华度修：(乾隆五年)《亳州志》卷一，清乾隆五年(1740)刻本。

④ (清)钟泰、宗能徵修：(光绪)《亳州志》卷一，清光绪二十年(1894)活字本。

由上可知,历史上亳州所辖区域范围较广,几乎囊括今天的河南之鹿邑、永城,及皖北之蒙城、太和等一大片地区。亳文化作为当地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文化,也是黄淮之间最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之一,其地理空间当以亳州为中点,涡河为轴线,包括皖北、豫东等大片区域,共同构筑成较为完整的亳文化区。

二、亳文化的地域特色

千年一脉传承下来的亳文化,是当地人们世代生产、生活的记录,是千百年来厚重历史的沉淀;更是人们认识自己、探索世界、思考未来、建构科学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亳文化也凸显了自身浓厚的地域特色,这种特色主要表现为与时偕行的超越与创新、海纳百川的包容与兼蓄、心怀天下的民本与现实三个方面。

1. 与时偕行的超越与创新

亳文化在萌芽时期就凸显了不断超越与创新的禀赋,如“尉迟寺一期文化遗存虽有大汶口文化的基本特征,但也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尤以陶器最为突出……上述特点与山东汶、泗流域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区别较大,表现出皖北地区的自身特点”。^①就皖北分布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而言,其性质相同者也较为普遍,如濉溪县石子山、灵璧县玉石山及宿县芦城孜等遗址,而蒙城尉迟寺遗存则创造了一个新的类型,“分布地域明确,自身特点清楚,可作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分布在皖北及其相邻地区的一个新的地方类型,我们称之为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②

建安时代,“三曹”耀世而出,并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创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执笔者:吴加安、梁中合、鹿俊倜:《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21~322页。

作的蜕变,开创了中国诗坛的一代新风,“他们(曹操父子)修习乐技,创制乐曲,创作了大量的乐府新诗,从内容到具体创作手法,对汉代乐府诗进行了全面的继承与革新,遂使乐府这种传统诗歌形式焕发了新的生机,并为后世作者进行乐府创作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①曹操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他以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贡献。“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②清代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价曹操文学成就时说:“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借古乐写时事,始于曹公”。^③而曹丕对我国诗体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尤其是《燕歌行》,开创了七言诗的先河;其长篇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王夫之在《古诗评选》卷一云:“长句长篇,斯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曹植则是第一位大力写五言诗的文人,以50多首五言诗,奠定了这一新兴诗歌形式在诗坛的地位,“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④

此外,“外科鼻祖”华佗首创“麻沸散”,并最早在病人全身麻醉的情况下实施腹部手术,这在世界麻醉史和外科手术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华佗成功地应用麻沸散进行腹部外科手术时候,世界其他国家的外科麻醉术尚处于摸索的阶段”。^⑤

2. 海纳百川的包容与兼蓄

亳州地处黄淮平原腹地,地势平坦,视野开阔,从而孕育出开放、豁达的亳文化。就道家文化而言,其自然和谐之观,展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如《老子》(二十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① 魏宏灿:《逞才任情的乐章——曹操父子与建安文学》,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② (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4页。

③ (清)沈德潜选:《古诗源》,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91~92页。

④ 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0页。

⑤ 严世芸主编:《中医学学术发展史》,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1页。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而丁德科在阐释时认为,其中“有象”是指万物的形象、原型;“有物”是指形形色色的万物;“有精”是指万物的精神实质,而且这种精神实质又非常真实,而且非常诚信,所以“‘道’中有象、有物、有精、有信,是有机的统一,富有无限的力量,蕴含着事物的层次和秩序,具有极大的包容性”。^①此外,道家文化中不仅包含有原始科学主义成分,而且包含有某些思想观念的精华,对现代科技文明的进步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在《创造力与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自序》中云:“可以肯定,这种经验对于我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是起了重大影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尤大。”

又如美轮美奂的花戏楼,与大关帝庙山门连为一体,墙面上的砖雕剔透俊美,雕刻精良,“内容有‘松鹤延年’、‘三星高照’、‘郭子仪做寿’、‘吴越之战’、‘三顾茅庐’、‘白蛇传’、‘老君炼丹’等图案,涉及流行戏文、名人轶事、吉祥图案、山水花木、鱼龙鸟兽、亭榭楼阁、织锦图案等七十余种”。^②由此可知,几乎把戏曲、宗教、民俗、传说等内容,有机地融汇于雕刻之中。此外,在民俗文化中,亳州剪纸在吸收南北剪纸艺术成就的基础上,形成了工巧洒脱的特色,以细腻传神而饮誉南北,“亳州剪纸构图丰满,粗细结合,融南北剪纸风格于一体,秀丽与粗犷并存,形成了淮北风格”。^③

3. 心怀天下的民本与现实

就建安文学而言,很多作品都表现出对现实的关切、对下层民众疾苦的同情。面对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情景时,

① 丁德科:《先秦儒道一统思想述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页。

② 汪东恒编:《亳州四名》,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2页。

③ 汪东恒编:《亳州四名》,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2页。

曹操在《蒿里行》中发出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感慨。全诗从叙述讨伐董卓开始，一直写到连年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如果没有心怀黎民的胸怀，则难以发出如此悲凉的感慨。正如陈元庆所云：“悲凉，一方面是由于‘世积乱离’（刘勰语）即连年不断战乱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诗人对百姓的同情心使然。”^①故钟惺在《古诗归》卷七中称曹操的此类诗为“汉末实录”。而曹植的《泰山梁甫行》：“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真实再现了当时人民的苦难生活；《门有万里客行》中：“挽衣对我泣，太息前自陈：本是朔方士，今为吴越民。”深刻揭示了战争使士兵归无定期、百姓不堪重负的社会现实。

身为新乐府运动先驱的悯农诗人李绅，其《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广大农民的艰辛劳动；而“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表达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慨和对贫苦农民的深切同情。正是因为具有这种抨击时弊、关心民疾的精神，使得李绅一直为后人所敬仰。

就亳州剪纸而言，很多作品在创作题材上，也展现出浓郁的现实生活气息，深受人们喜爱，“创作题材也由原来的花鸟虫鱼、飞禽走兽，以及一些表现民俗的喜庆吉祥之物，发展到以人物和现代社会生活题材为主。不仅具有装饰性和抽象意味，而且具有鲜明的内容和意旨”。^②

三、亳文化的现实意义

丰富多彩、历史悠久的亳文化，彰显着鲜明的时代价值，其中许多内容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① 陈元庆撰：《三曹诗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② 汪东恒编：《亳州四名》，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2页。

1. 自然和谐的应世智慧

在道家文化看来,人是自然孕育之物,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主张人要效法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使人与自然达到和谐统一的理想境界。如《老子》(二十五章)中所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只有人与自然达到和谐发展,才有可能获得比较光明的未来。老子思想的继承者庄子,在《庄子·天道》中则提出“天和”与“人和”的思想观点,“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其中的“人和”的意思是人与人之间,应保持一种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而“天和”的意思是让人与外界万事万物的客观世界,也保持一种自然和谐的关系。总之“道家的自然和谐观崇尚自然无为,主张返璞归真,要求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共生共荣,这对于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清静优雅,保护自然资源不被滥肆开发是有积极作用的”。^①

明清时期,亳州城区及其周围,修建有大量的私家园林,这些私家园林在建筑风格方面,既不追求江南园林的“柔媚”,也不崇尚北方园林的“刚健”,而是寻求不尚雕饰、浑然天成的自然和谐之美。如薛凤翔《亳州牡丹史·别传·纪园》卷二记载:“(常乐园)园内文石玲珑嶙然玉立,石后茅屋数椽,不事雕饰。”“(凉暑园)中构亭榭,间以茅屋,竹树蓊蔚,称佳境矣”。据亳州旧志记载,有文献可查的明清亳州私家园林多达28处,其筑园风格大都以和谐自然为尚。又如华佗所创的“五禽之戏”,他模仿自然界中五种动物的动作,创编出一套导引之术,其中的虎举、鹿奔、熊晃、猿摘、鸟飞,这些动作名词及术语,无不蕴含着浓烈的自然色彩,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演绎得尽善尽美。

^① 吴光:《简论道家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资源及其现代意义》,《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2. 崇朴尚俭的生活态度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道家文化所积极倡导的人生之道。道家主张人们应保持崇朴尚俭的生活态度,如《老子》(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极力反对追逐声色犬马的奢靡生活,应保持《老子》(十九章)所云“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生活态度。继之而起的庄周在《庄子·逍遥游》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可以说道家文化中崇朴尚俭的生活态度,被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所接受、践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延续和复兴,均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正因为具有节欲尚俭的精神,中华民族才得以历尽苦难而生生不息,备遭洗劫而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①

一代英雄曹操,也非常重视节俭,反对奢侈,并且身体力行。据《三国志·武帝纪》卷一载:“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常以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故预自制终亡衣服,四篋而已。”曹操不仅严格要求自己注重节俭,还对后宫及子弟的生活标准作了严格规定:“太祖愍嫁娶之奢僭,公女适人,皆以皂帐,从婢不过十人。”^②其目的也是引导人们保持崇朴尚俭的生活态度。此外,他还积极推行薄葬之法,在为自己选定墓址问题上,他下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③即使在临死前,还通过《遗令》要求后代不准隆丧:“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

① 李平权:《刍议道家文化的时代价值》,《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② (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4页。

③ (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1页。

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①时至今日，这种崇朴尚俭的生活态度，依然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

3. 为而不争的社会文明

道家文化认为，“道”不仅是万物之源，而且具有较强的功用，如《老子》(五十一章)云：“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孰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通过拟人化的语言，使人更具体地领悟道的自然客观性，并告诉世人怎样效法道的为而不争的道理。《老子》(八十一章)云：“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又以圣人为例，进一步揭示为而不争的玄机。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物质生活的丰富与社会道德的缺失，这种不同步现象时有发生。“老子对古代文明中物质生活进步和道德水平下降的批判在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性”。^②

身处竞逐荣势、企踵权豪时代的华佗，却能“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③这种不矜名利、以百姓疾苦为念的精神，充分展现了一代神医淡泊名利、勤医为民的崇高品德和高尚人格，直至今天，依然受到世人的敬仰。又如在中国思想史上享有崇高声望的宋代陈抟，虽“怀经纶之长策，不謁王侯；蕴将相之奇才，未朝天子”。^④一生著作颇丰，仅诗词就有600余首，很多诗文展现了他不慕权贵、寄情山水的高隐情怀。

① (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3页。

② 罗映光：《道家文化及其现代价值》，《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③ (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99页。

④ (元)张栻：《太华希夷志》，《道藏》(第5册)，第735页。